



清华哲学研究系列

王玖兴文集

Collected Papers of Wang Jiuxing

崔唯航 选编

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

清华哲学研究系列

丛书主编:万俊人

丛书副主编:王晓朝

王 路

王中江

王玖兴文集

Collected Papers of Wang Jiuxing

崔唯航 选编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玖兴文集 / 崔唯航选编. — 保定: 河北大学出版社, 2005.5

ISBN 7-81097-051-8

I. 王… II. 崔… III. 王玖兴—文集 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11357号

责任编辑: 王仲华

装帧设计: 赵 谦

责任印制: 闻 利

出版: 河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河北保定市合作路88号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制: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
规格: 1/32 (880mm×1230mm)

印张: 20.5

字数: 533千字

印数: 0001~3000册

版次: 2005年4月第1版

印次: 2005年4月第1次

书号: ISBN 7-81097-051-8/B·35

定价: (平)39.00元 (精)49.00元

哲學概論講稿

王政

丛书主编:万俊人

丛书副主编:王晓朝

王 路

王中江





道通天地有形外

思入風雲變化中

王叔平



“国际辩证哲学协会”又名“黑格尔协会”(Societas Hegeliana), 是当今三个国际性的黑格尔学术团体。第一个叫“国际黑格尔协会”(International Gesellschaft für Hegels Philosophie) 现任主席是凯迈尔勒教授(Kimmerle), 第二个叫“国际黑格尔联合会”(Internationale Vereinigung für Hegels Philosophie) 现任主席是福尔达教授(Fulda)。本来这两个学术团体召开的国际大会, 都有东方和西方的学者^和同时参加。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, 去年(1987) ^{第十个团体} 分别在柏林和斯图加德^{召开的大会(德国哲学界每年召开)} 召开的会议, ^{第一个团体在} 苏联东欧各国学者^都没参加。(俄国由^{副总统} 戈尔巴乔夫率领一个代表团, 参加了^{第十个} 斯图加德的会议)。只有这次由“国际辩证哲学协会”在巴黎召开的大会, ^{只有} 除西方各国的学者出席外, ^精 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学者^也都前来参加。所以会议规模很大, ^{西式} 参加会议人数多达三百人。(这是这次大会的一个特点。)

★
易学级

东西方学者共能一堂交流为奇观也
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15 × 20 = 300

“清华哲学研究系列”学术编辑委员会

学术顾问:周辅成 汪子嵩 杜维明

主 编:万俊人

副主 编:王晓朝 王 路 王中江

编 委: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万俊人 贝淡宁(Daniel Bell) 王 路

王中江 王晓朝 卢 风 艾四林 刘小枫

陈 来 肖 巍 卓新平 吴 倬 邹广文

赵甲明 赵敦华 胡伟希 唐少杰 蔡曙山

主编助理:唐文明 宋继杰

责任编辑:左高山 王韬洋

序一

汪子嵩

玖兴离开我们已快两周年了。

我和玖兴初次相识是在 1945 年，那年暑假我在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，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，当陈康先生的研究生。玖兴是在 1944 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当研究生的，他比我早一年。他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的，来到昆明后，他自己说听了哲学系许多位教授开的课，大概我和他同堂上过几门课，但我留有深刻记忆的是陈康先生为研究生开的一门“柏拉图哲学著作选读”课，陈先生领我们读柏拉图《国家篇（共和国）》的部分章节。上课时我们每人都得带上一本 Jowett 的英文译本，轮流读其中一段，解说中文意思，然后由陈先生讲述，从分析柏拉图的逻辑论证说明其中的哲学思想，实际是把着手教我们怎样读哲学原著。选这堂课的学生不多，只有玖兴和我两个研究生，还有一两位哲学系高年

级学生，其中就有王太庆；来旁听的是贺麟先生主持的哲学编译会的编译员陈修斋、邓艾民、孙霄舫，他们也参加轮流读讲。上课是在联大校舍角落一间僻静的小教室里，我们七八个学生每周有半天一起上课，课间休息时相互交谈，便是这样认识起来的。

我只是说“认识”，真正的熟识要到30多年以后才能算。1945年是关键的一年：抗日战争刚结束，国内的国共内战马上就要开始。在昆明，先是蒋介石动用武力逼走了云南实力派龙云，想以此镇压民主运动，却引起更大的学生运动，造成“一二一惨案”。我那时已经参加“民青”组织，是不出头露面的，而是做隐匿的地下工作：参加读书会，在校园内出大字报，编《罢委会通讯》、《学生报》等。我虽然也认真听陈先生的课，开始爱好希腊哲学，但实际上这只是我的副业；下课以后，便去参加其他活动了。玖兴他们是真正读书的学生，我们之间缺少共同的语言，很少沟通。这次看他的文集清样，才知道当时有“哲学问题讨论会”，我却从来没有参加过。

这本文集的第一篇文章《柏拉图的哲学方法》为我们的初次相识留下了纪念。玖兴在文章开始时讨论哲学方法是“哲学家说出来的哲学方法”，还是“哲学家获得和使用哲学的方法”的问题，一望而知，这是他的导师冯友兰先生经常使用的讨论方法。但当他谈到正文柏拉图的哲学方法即辩证法时，他所举的实例，如：苏格拉底的问答法、《国家篇》中的洞穴太阳说、《智者篇》中的“通种论”、《曼奴篇》中的回忆说、《斐杜拉斯篇》中的综合和分解等，都是陈康先生在讲课时重点分析的方法。不过陈先生着重的是分析柏拉

图自己的逻辑论证，而玖兴却将这些方法提到逻辑学的层面加以讨论。由此可见，玖兴既听了课，自己读了书，又记得金岳霖先生是他的导师，必须重视逻辑问题，他是学而深思，将这些方面融会到对整个哲学的理解上了。他在“哲学问题讨论会”上提交的另外两篇报告也具有相似的性质。《黑格尔哲学中的几个要点》不仅是他当时听贺麟先生讲“黑格尔哲学”的收获，还有他在武汉大学读书时，曾经是国内最早的黑格尔专家学者张颐老先生的得意门生，才能写出这样精辟的报告。至于另一篇《论必然命题》，则明显表示他已经是金岳霖先生的弟子了。

1946年玖兴在清华大学讲授“哲学概论”和“知识论”的讲稿也保留下来了，很有特色。一般教师讲“哲学概论”，往往主要是介绍某种哲学思潮、流派或某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，更喜欢发挥他自己的研究心得以至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。有点以偏概全，使学生误以为这就是所谓“哲学”了。而玖兴却是将哲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来讲，从什么是哲学讲起，讲哲学的诞生、分化、发展，直到哲学的分科，使学生对于究竟什么是哲学，有比较全面的了解，真正是哲学的 introduction。当然，由于哲学本身的原因，从两千多年前开始到现在，究竟什么是哲学？众说纷纭，不像一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那样有公认的定论。玖兴也只能从他自己学习得到的体会，依照当时比较流行并为较多人接受的看法，作这样比较客观的介绍。我以为，这样的讲稿，即使在今天，对于许多想了解究竟哲学是什么的人，读读也是有助益的。

1948年玖兴去欧洲留学，张颐老先生劝他到德国去，

因为那里是哲学的故乡。可那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德国到处是断瓦残垣，他只能到瑞士的弗莱堡大学学习德国古典哲学。虽然玖兴自己说他去西方留学是想以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，将来回国使中国哲学的精华发扬光大。但在国外学习德国古典哲学之余，对当时流行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发生兴趣，觉得它和中国哲学的精神有较多相近的地方，因此也学习了欧洲当时流行的现代哲学，后来走上这条“不归之路”，而将弘扬中国哲学的理想留给他的学生了。

这里我想谈点我所了解的清华哲学系的研究生情况。那时候的清华、北大哲学系招收研究生很少，一年难得招上一个。1944年玖兴考上清华研究生时，哲学系原有的两位研究生刚刚毕业：一位是冯宝麟，即后来著名的哲学家冯契，他当研究生时是跟汤用彤、冯友兰先生学习中国哲学史的。他在清华哲学系当学生时参加“一二九”学生运动，抗日战争时到过延安，后来回昆明西南联大复学，1941年毕业后考上研究生。晚年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、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融会贯通，创造了以《智慧说三篇》为代表的宏大的哲学体系。另外一位是王浩，我记得他和玖兴一样，在抗战前夕是全省高中毕业生会考的“状元”，不过他在山东省，而玖兴在江苏省。王浩在联大数学系毕业后因为对哲学，尤其是对数理逻辑有兴趣，考入清华哲学系当研究生，跟沈有鼎、王宪钧先生学习数理逻辑。研究生毕业，于抗战结束后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。后来在数理逻辑的研究上有重要贡献，是国际知名的逻辑学和哲学专家。1946年玖兴研究生毕业时，周礼全考入清华哲学系当研究生，他又是清华哲学系培养的一位逻辑专家。礼全是1941年和我同时考入联大哲学系的，



他曾因病休学一年，所以在1946年才当研究生，那时清华已经复员回到北平。从昆明联大到1948年玖兴出国留学这段时期，玖兴和周礼全、王太庆常在一起切磋学问，是好朋友。我想，他们就是当年“哲学问题讨论会”的主力，后来太庆还常提到当年他们怎样帮助玖兴办出国手续的故事。

我还想谈到另一位清华哲学系培养的学者任华先生。那时一般的说法是：清华哲学系的重点是逻辑学，北大哲学系的重点是哲学史，严格说是指西方哲学史，因为从冯友兰先生主持清华哲学系后，中国哲学史当然成为它的重点。据说，在抗战前夕，北大哲学系的逻辑课程往往由清华教授兼任，而清华的西方哲学史课，则常由北大教授兼任。因此，清华哲学系要培养自己的西方哲学史教师，任华先生就是由此被选送去美国哈佛大学专门学习西方哲学史的。后来我听王浩说，1946年他刚进哈佛时，任华先生得到博士学位，正准备回国，对这位新来的学弟热情照料，为他安排生活。任先生回国后在清华讲课，当时张岱年先生刚回到清华，他们两位分别讲授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，是清华哲学系教授中的的新秀。1952年院系调整，合并为北大哲学系。当时西方哲学史教研室人才济济，不过许多先生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，而任先生却是西方哲学史的通才，从古代希腊哲学直到近现代西方哲学他多有过研究，知识广博。开始时教授不能讲课，只能翻译资料，任先生是主力之一，后来开始讲课，任先生是首先上堂讲课的教授。任先生为人谨言慎行，在上世纪50年代还能逃过厄运；60年代初期编写各种教材，他是西方哲学史组的主编，但那些教材尚未定稿时，又搞起阶级斗争，要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潮了。接着发生

史无前例的“文革”，我和任先生一直没有共事过，那时候却意外地有一次共同工作的机会：1973年庐山会议，毛泽东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，号召干部“要学习一点哲学史”。出版社到北京大学去组织编写西方哲学史的书稿，却遭到北大军宣队领导的拒绝，他们说：“我们只搞马克思主义哲学，不搞资产阶级的东西。”出版社最后找到我，要我出面组织编写，报社领导同意我暂时离职工作，我提出要求北大同意任华和张世英两位和我一同编写。这时候我发现任先生变得衰老，又特别胆小，请他提出意见他也很少讲。我知道他在运动中受过苦难，加上他夫人去世的悲痛，是不是他对当时的写法还有点意见？那时主要依靠世英的力量，我们总算交了卷，完成了《欧洲哲学史简编》那本充满阶级斗争观点，却又据说是“文革”期间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惟一的所谓“学术著作”，现在看来问题不少，幸亏早已绝版。“文革”结束后学术界逐渐活跃起来，但任先生却非常消沉，没有参加活动。我记得王浩以国际知名学者身份回国，受到热情接待，但他要求和任华先生会面时却遭到拒绝，理由是：任先生身体不好，不愿会客。王浩对我讲，我不相信任先生会不愿会见王浩，就陪他直接到任先生家里去拜访。任先生看到王浩非常高兴，他们谈当年在哈佛会面的情节，王浩向他介绍哈佛旧友现在的状况。我看任先生谈锋甚健，只是因为双目几近失明，生活无人照料，不能出外活动，久居室内，总觉得自已多种疾病缠身，因而情绪消沉。出来后王浩几次向我说：像任华先生这样的人才，不能好好发挥他的作用，实在可惜。任先生又这样过了好几年才含憾去世。

这件事一直搁在我心里，我也有点负疚，现在看到玖兴

的遗稿，有人将它整理出版，我想乘此机会提出来：任华先生的遗稿是不是也还有保留下来的？能不能整理出版？

还是回头再谈玖兴。玖兴在瑞士弗莱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，留在那里教中国哲学。1956年冯友兰和任华两位先生去日内瓦参加学术会议，会上和玖兴见面后又专门去玖兴家里，告诉他国内欢迎知识分子回国，动员他回来。玖兴全家于1957年回到北京，可又恰恰赶上风云突变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这是为什么？》的社论，正式开展“反右”运动。玖兴到北大拜访冯友兰先生那天，校园内铺天盖地贴满了批判右派的大字报，冯先生看到玖兴穿着西服，怕被学生误会，还留他在三松堂过了一晚。玖兴知道这时候如果上课堂，必然“开口便错”。他接受金岳霖和冯友兰先生的意见，不接受北大教授的聘书，而去哲学所当研究员。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，在随后几年中他能比较平静地以翻译为主，和贺麟先生合作翻译了黑格尔的名著《精神现象学》和其他一些著作，并且写作了几篇学术论文。“文革”期间玖兴虽然也遭受抄家和下放劳动之苦，但比起北大教授来，终究比较轻松。“文革”结束以后，他虽然还是谨慎小心，但逐渐参加各种活动。他已经是著名的翻译家了，参加翻译不少哲学名著；在大学讲授德国古典哲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等，发表论文或留下讲稿；更重要的是在参加国际哲学会议方面发挥了才能。

这时候我的思想也逐渐经过反思，最后决定转变方向，回头重新捡起希腊哲学，这样，我和玖兴走到同一条道上。上世纪80年代，参加《大百科全书——哲学卷》的工作，我和玖兴、世英、太庆、钟宇人、王树人一起负责编定西方

哲学史的条目。上距 1946 年和玖兴初次相识，已将近 40 年了。

我们在北京、烟台、无锡等地一起工作过，记得讨论最后定稿是在无锡，我们将有问题的条目一条一条地进行讨论，然后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，指定一位加工修改。玖兴和大家一样积极发表意见，负责修改，我才领教他那清楚精密分析的能力。工作休息的时候，我们在太湖之滨散步聊天，往往会谈到当年在昆明联大时期的一些轶事，打破了过去一些隔阂，结下比较真诚的友谊。

80 年代后期，我们几个 70 岁左右的同龄人：玖兴、礼全、世英、太庆、我，还有何兆武、黄楠森、李德齐，有时约起集会，共聚友情。我们中间数玖兴年龄最大，他那时身体和精神都还可以。我还记得有一次傍晚从西郊北大聚会回来，我和玖兴同乘一辆公共汽车，我在车上还向他请教一些有关翻译的问题。进入 90 年代以后，玖兴的身体慢慢差起来了，我也关起门搞《希腊哲学史》，不参加学术活动，很少和他见面。关于他的情况，往往是太庆在电话中告诉我的。不想刚刚在新旧世纪之交，太庆和玖兴却先后离我们走了。

玖兴回国后主要从事翻译，他和贺麟先生合译的黑格尔《精神现象学》早已有口皆碑。我很早就听太庆说，玖兴和他准备合作翻译康德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，现在才知道，那是早在 60 年代初，太庆被调到宁夏银川时，向玖兴提出来的。《纯粹理性批判》是西方哲学史中影响最大却也是最难读懂的一部著作，我国虽然出版过胡仁源和蓝公武两位先生各自翻译的中译本，但他们都是早在 30 年代翻译的，从文